

春秋集萃

文史觀瀾

周北川 等◎主编

(二)



中国文史出版社

春秋
集萃

文史觀瀾

(二)

周北川等◎主編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观澜. 二 / 周北川等主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205-0115-6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现代 IV. ①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1068号

责任编辑: 刘 夏

封面设计: 陈欣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政编码: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35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卞晋平

多年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文史资料园地的耕耘，征集和发表了大量富有人文史料价值的“三亲”文稿，《春秋周刊》也因此而成为广受读者欢迎的文史名刊。最近，周刊编辑部对已经该刊发表的文稿进行整理，并选其优秀、辑其菁华，冠以“春秋集萃”之名，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公开出版。我作为一名职业文史工作者，也作为《人民政协报》的原任老总编，闻之甚喜，深以为这是政协文史工作领域的一件盛事。在“春秋集萃”这套系列丛书中，《抗战忆事》和《文史观澜》两辑先行面世，我先睹为快，欣然作序，以襄其盛举，并借此机会有感而发地说几句话。

其一，纵览两辑书目，第一感觉就是刊载文章的时间跨度大，所涉事件与人物多，作者五湖四海，角度见解不同。为什么要把这些看似零散、有些甚至彼此互不搭界的文章汇编在一起呢？原因就在于，所有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各界人士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直接记述，是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和知情人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

料。“三亲”是它们共有的也是最突出的特点。

其二，征集和出版这样一批个人撰写的反映个人一隅之见、一得之说的文章，有什么意义呢？不仅有意义，而且意义不小。说到文史资料的价值，人们通常有两个视角：一是说它的史学意义。文史资料不是史书，不是档案资料，也不是学术论文，而是具体的、生动的、鲜活的直接记述作者亲身经历或见闻的史料，是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界别的人站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看问题并把它记述下来的人文资料。文史资料的特殊作用就在于，它可以在“广征博集”的基础上，通过不同人物、不同角度的“多说并存”，来见证历史。因此，它可以起到“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作用。另一个视角是说它的社会意义。正如贾庆林同志所说，文史资料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具体形象生动地记录了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而拼搏、奋斗的历程，体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伟大意义。因此，它可以起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意义，读者会从这套系列丛书中感受很多。

其三，个人文章各说各话，其真实性 and 可信度如何呢？这的确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因为真实性是文史资料全部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众所周知，古往今来任何人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上生活，任何史料都是一定社会环境下一定个人或一定人群的产物。文史资料的作者来自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党派团体、不同的利益群体，作为个人，他们都有自己习惯的思维方式、观察事物的特定角度、看问题的具体立

场和方法，因而任何一篇具体的文史资料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自己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印记，难免会有视野或角度上的某些局限性，也难免会有某些记忆上的偏差。所以，尽管我们要求每一篇文史资料都要如实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但在征集到的各种文史资料中存在某些局限、某些失准、某些偏见、甚至某些虚构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说，文史资料的真实性，不能只依靠史料撰写者的个人觉悟和征集人的主观愿望来保证。从根本上讲，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三条：一是广征博集，多说并存，对各种相近或相异的表述加以比较和鉴别，从中获取最为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多说并存”是保障文史资料真实性的前提条件。二是把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史料、分析史料。三是对待具体问题还必须进行认真的核实查证、去伪存真。说到底，个别史料只能为人们提供参考，而不能作为定论的依据。只有将若干个个别史料汇集在一起进行相互比较和印证时，个别史料的价值及其作用才能体现出来。

其四，57年前，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同志亲自倡导开创了人民政协的史料征集工作，并亲自为人民政协征集的这种“三亲”历史资料定名为文史资料。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政协文史工作历经风雨，硕果累累，先后征集了80多亿字的历史资料文稿，编辑出版了50多亿字的历史资料图书，各级政协共有30多万人次通过各种形式参与过文史资料工作。文史资料作为一项最具政协和统战特色的优秀文化产品，越来越深入社会、走近群众，社会影响日益扩大。许

多文史资料出版物从“养在深闺人不知”到“飞入寻常百姓家”，已经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读物。现在，思想观念的解放、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的大潮，又进一步为文史资料的发展搭建了新的平台，开辟了新的天地。文史资料的特性决定了它只能是当代人写当代事，一代人写一代事，而不能隔代相求。很多重要的史料抓一抓就可以留下来，松一松就可能永远失去。因此，文史资料是必须与时俱进、及时抓紧征集的。做好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是人民政协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各级政协从事文史工作的同志一定要用心努力，接好周恩来同志亲自开创的文史资料事业接力棒，并将它顺利地传承下去，发扬光大。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应当为《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的作为喝彩。

2016年3月

（这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卞晋平同志为“春秋集萃”丛书所作的序）

目 录



昔 忆 ⋮ 239	素 描 ⋮ 214	交 游 ⋮ 186	治 学 ⋮ 148	识 见 ⋮ 121	意 趣 ⋮ 97	态 度 ⋮ 82	品 行 ⋮ 54	性 格 ⋮ 41	百 态 ⋮ 1
---------------------------	---------------------------	---------------------------	---------------------------	---------------------------	--------------------------	--------------------------	--------------------------	--------------------------	-------------------------

CONTENTS



❖ 汤用彤送板鸭

汤用彤是中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印的大师，他在中、西、印文化与哲学思想研究上，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献，在这三大文化领域内都立下了一座座丰碑。在为人处世上，钱穆在《忆锡予》中评价道：“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由于他为人随和，朋友们则给他取了一个绰号——“汤菩萨”。

汤用彤把全部心血都用在了著书立说和教书育人上，一生遵从祖训：“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淡泊名利，不愿涉足政治。梁漱溟曾邀请他参加民盟，他拒绝了。1948年底国民党南逃时，胡适力邀他去南京，他也拒绝了。

1949年1月29日，北平和平解放。他在毛泽东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因为百余年来在西方列强和日寇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人民受尽苦难，使他们这些拥有强烈自尊心的知识分子深感耻辱。

共产党军队进入北平后纪律严明，干部清廉公正，特别是一些

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说到做到。与1946年国民党接收北平时，耳闻目睹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抢房子、车子、金子形成天壤之别。5月，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任命汤用彤为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他欣然接受了。1949年11月，他的儿子汤一介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他知道后对汤一介说：“祝贺你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许中国复兴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

1952年北京大学院系调整之初，汤用彤就搬进了北京大学居住。一天，北大副校长江隆基请他到家里吃饭，他就顺便把别人从南京送来的两只板鸭送给江隆基。无论怎么说，江隆基就是不收。这事后来汤用彤对儿子说：“共产党说不收礼，真是说到做到。”一生清廉的汤用彤，开始从内心敬佩共产党。

（沈治鹏）

❖ 汪曾祺逛旧书摊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他对昆明的旧书摊颇为熟悉，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汪曾祺大多不是买书而是卖书。

当时，昆明的旧书摊大多集中在文明街的北头路西。这几家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于书的内容都不大内行，只要是稍微整齐一点的书，古今中外、文法理工，老板都收，而且收购的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只要拿过去，当时就付钱。

那时，汪曾祺的经济非常拮据。一天，其同学、后来成为著名古文学专家和语言学家的朱德熙看到他快到中午了还不露面，便知道汪曾祺的午饭没有着落。于是便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房间，推推他：“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两人卖掉了字典。

卖字典的钱，够两个人吃上一顿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

汪曾祺回忆说：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他的一个同学发现一家旧书店的《辞源》收售价比原价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以原价买到，转身即以高价卖给那家旧书店。如此反复，这位同学的搬运工作干了好几次。

多年后，汪曾祺仍对在昆明卖旧书的过程记忆很深，而对当年买进什么书反而不清楚了。

1946年秋，汪曾祺到了上海，在福煦路的致远中学任教。期间，汪曾祺仍时不时地逛旧书摊。

当时致远中学有一个工友老许，负责打扫卫生和烧开水。老许在校门外摆了一个旧书摊，书平摊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老许坐在校门内，一面扫地或烧开水，一面向地摊上看着。同学们进进出出，总要蹲下来看看他的书。而这些书非常便宜，和卖废品的价钱差不多。

汪曾祺曾买过老许两本书。一本是张岱的《陶庵梦忆》，后来不知放哪儿去了。另一本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这是很名贵的。书中汤显祖的批语包括眉批和每一出的总批，都极精彩，这本书被汪曾祺视同珍宝。

后来，这本书也不知被谁借去未还，弄得汪曾祺想引用汤显祖的批语时，只能凭借大脑的记忆了。

（姜炳炎）

❖ 朱自清相亲

1930年8月的陶然亭酒楼，在清华大学历史学家顾颉刚教授的

安排下，33岁的一代文学大师朱自清与28岁的女学生陈竹隐相亲，就此谱写了一曲荷塘清风般的浪漫恋歌。

当时，朱自清的发妻武钟谦去世已经有一年多了。原本就清贫的朱自清，每日周旋在六个孩子和工作中，生活相当窘迫。身边的朋友都极力劝朱自清续弦，但朱自清每次都婉拒了，他念念不忘和武钟谦相依相伴十多年的深情岁月，于是打定主意终身不再娶。

因此，朱自清的这次相亲，是在他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著名画家溥侗和清华外文系教授叶公超诿朱自清去陶然亭酒楼小酌，他便欣然前往。

陈竹隐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是国画大师齐白石和昆曲大师溥侗的弟子，既画得一手国画，又精通昆曲，虽然出身贫寒，却是一个朴实善良的女子。

朱自清那天身着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白净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雅正派。美中不足的，是脚上穿的是老式双梁布鞋，这很土气的样子让陪同陈竹隐的女同学笑了半天，回到宿舍后说坚决不能嫁给这种土里土气的人。

然而在陈竹隐的眼里，朱自清的形象分并没有因此而打折。相反，陈竹隐很看重朱自清的朴实与正派，特别是他的诗歌散文中所表现出的深沉细腻的感情、所描绘的一幅幅恬静柔和的画面以及贮满诗意的语言，丝丝扣动着她的心弦。虽然朱自清有六个孩子，但是像他这样一个专心做学问又很有才华的人，应该有个人帮助他，于是她决意要与他交往下去。而陈竹隐白皙的面庞、清秀的短发、落落大方的谈吐，如同一朵清雅的荷花，给朱自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后，朱自清开始约陈竹隐一起去吃饭、看电影。每一次的约会中，活泼开朗的陈竹隐都让朱自清感受到一个全新的情感世界。

1932年8月4日，自英国访学归来的朱自清在上海与陈竹隐举行

了婚礼。那天，正是他们相识两周年的日子。

(陈卫卫)

❖ 钱穆热爱旅游

钱穆是国学大师，他平时不苟言笑、埋头治学、惜时如金，但他又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毕生有两大爱好：一个是昆曲，另一个就是旅游。

钱穆十分欣赏朱子“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但他早年困居于家乡太湖流域一带，出游机会少，难如其愿。不过这也难不倒他，他大量阅读中国地理书籍，上自《汉书·地理志》，下迄清代嘉庆《一统志》，尤其是酈道元的《水经注》，他更是经常阅读，还幽默地称这是借读书卧游。

治学之余，每到一处，钱穆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居北平期间，他几乎年年出游，“余在北大凡七年，又曾屡次出游”。这期间有四次远游：第一次是和北大诸生畅游济南大明湖、曲阜孔林与泰山；第二次是和清华师生同游大同，观云冈石窟；第三次则是一人独游武汉，登黄鹤楼，参观武汉大学，并乘船至九江，遍游庐山风景；第四次复与清华师生游故都开封、洛阳和西安诸胜，归途还游历华山。

在西南联大期间，即便条件十分艰苦，钱穆也是游兴不减，足迹遍及广东、湖南、广西、云南、四川、贵州各省，许多当地人没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钱穆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

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钱穆解释说：“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

（洪德斌）

❖ 齐白石的“抠门”

齐白石的画很值钱，但是他并没有大手大脚，反而有点“斤斤计较”，有点抠门。关于齐白石抠门的故事，如今流传的不少，但他自有对钱的思量，有时，他的大方与谨慎，与一般人不同。

齐白石卖画时的确“抠门”，对于价格他锱铢必较。有人来买草虫画，齐白石回答：“年纪老了，眼光不好，工笔草虫不画了，真是对不起价格，没有了。”买画人再次请求。齐白石看其有诚意，就半晌才说：“有是有一部，不过是太太藏起的，不知她肯不肯卖。”买画人更急了，他就拉直嗓门：“有位贵客要看看你那部草虫册页哩。”齐夫人在房中说：“这部册页是不卖的。”齐白石又大声说：“贵客看中得意，能出大价钱哩。”价格就在这一问一答中被提高了。

齐白石除了画画，对日常生活不甚关心。

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里，讲述了李可染引荐他第一次拜见齐白石的情景。齐白石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路上李可染已关照过黄永玉，齐白石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搬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而且还都是坏的，吃不得。寒暄就座之后，黄永玉远远注视这闻名已久的

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齐白石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哪个馋嘴的客人干掉的。

然而，齐白石对朋友和学生是十分热情慷慨的。

20世纪50年代初，黄苗子和李可染一起去看齐白石。临走时，齐白石颤颤抖抖地从衣袋里掏出两元钱，一人分一元。黄苗子正要推辞，李可染悄悄地说：“这是老师的规矩，如果不要，他会生气的。”那时有朋友约好了，到了齐白石家的时候，齐白石会拿着一块钱，站在胡同口等着，黄包车来了以后，他就会付这个黄包车费。

李可染去欧洲写生之前，齐白石送他的印泥贵如黄金。所有弟子加上他们的小孩，不是给钱就是给画，而且很多重要作品，就这么给出去的。这时候会发现，齐白石竟那么地大方，这种反差让人明白：齐白石自己内心里，有一条线，“抠门”与否，他一直在认真地把持着。

（高中梅）

❖ 钱穆出“难题”

国学大师钱穆晚年著有《师友杂忆》一书，回忆了同一些大师名家、著名学人的交往轶事，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1928年，33岁的钱穆正在苏州中学执教。一次，校方请胡适来学校演讲。胡适时任中国公学校长，可谓大名鼎鼎。

演讲开始前，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看见钱穆也坐在台下，便邀

请他到台上来，同时介绍给胡适。见了钱穆，胡适一开始还很高兴，说了些“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的话，随后又取出一封信为证，信是胡适的一位朋友写的，提醒他到了苏州，千万不要忘了两件事：一是买一部江湜的《伏敌堂诗录》，二是想法见钱穆。

当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里面涉及《史记六国年表》一书，钱穆本身没见过这本书，心中“积疑积闷已久”，整天惦记着。今天见了胡适，寒暄几句后，钱穆一下子想起了《史记六国年表》，心想胡适是中国公学校长、曾是京师大学堂教授，一定见多识广，因而便有点冒失地问：“先生，可曾见过《史记六国年表》？”

让人想不到的是，胡适经不起这一问，当即语塞，表情很不自在，也不再搭理钱穆，场面甚是尴尬。好不容易等到演讲结束，胡适便急着赶回上海。汪懋祖一再挽留，胡适还是执意要走。

这件事过后好多年，钱穆每每说起，也很过意不去。觉得自己和胡适初次见面“即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自责“不习世故”，对胡适先生有些“失礼”。

（姜炳炎）

❖ 黄侃给胡适起外号

黄侃是近代一位国学大师，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造诣颇深，有人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但他思想守旧，极力反对“白话文”，加之他恃才傲物，喜欢骂人，因此，他与白话文倡导者们时有交锋，而被骂得最惨、取笑最多的当属年纪轻轻便“暴得大名”的胡适，他常常弄得胡适下不来台。这还不够，他还借题发挥，给

胡适起外号加以讥讽。

1916年8月23日，胡适写了一首诗叫《朋友》，发表于1917年2月号的《新青年》杂志上，诗题改为《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时在北大任教的黄侃看到这首诗以后，在《文心雕龙札记》一文中大骂白话诗为“驴鸣狗叫”，直呼胡适为“黄蝴蝶”。五四运动以后，北大校长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这就更引起黄侃的不满，他讥讽胡适为绕蔡元培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胡适的学术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及《中国白话文学史》都是在早年完成的，影响甚大，但是都只有上部，下部长期待之阙如。黄侃抓住这一点，曾在南京中央大学的课堂上放言：“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黄侃解释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黄侃是存心讽刺胡适的著作只有上部，没有下部。此喻遂传为笑谈。

黄侃站在旧派立场反对新文化，对胡适嘲讽、奚落，着实有损其国学大师的形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并没有对胡适进行人身攻击，他的行为倒是颇能体现他的真性情、无城府的一面，也算是一个“另类君子”吧。

（洪德斌）

❖ “古怪教师” 黄侃

黄侃曾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一课，以《文心雕龙》作为学生的课本。然而他只给学生讲课，却不给学生们布置作业。